

〔日〕森贞彦 著

王宣琦 译

总主编 冯天瑜 〔日〕刘建辉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菊与刀》 新探

贝尼迪克特从菊花所象征的日本人内心情感和日本刀所象征的社会责任感入手，

深入探讨了人类的无意识性，

找到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所在。

本书作者正是站在这一新的观点上，
写出了揭示这一问题的第一部文献。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日〕森贞彦 著

王宣琦 译

总主编 冯天喻 〔日〕刘建辉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菊与刀》 新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与刀》新探/(日)森贞彦著;王宣琦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0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307-05878-1

I. 菊… II. ①森… ②王…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②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IV. G131.32 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1409 号

“KIKU TO KATANA” SAI HAKKEN

By MORI Sadahiko

Copyright ©2002 MORI Sada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TOKYO TOSHO SHUPPANKAI,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ORI Sadah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COPYRIGHT OFFICE, China.

此书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东京图书出版会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7—2006—028 号

责任编辑:胡国民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5.625 字数:127千字

版次: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878-1/G·1030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20 世纪初叶，文化传播学派代表学者德国人格雷布内尔（F · Graebner 1877 ~ 1934 年）与奥地利人施密特（W · Schmidt 1868 ~ 1954 年）提出“文化圈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每个文化圈包含一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有成分。此说庶几反映世界文化史实际，故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被普遍采用。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造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近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往往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或曰“文化核心区”、“文化源地”），以其首创的文化播扬于周边地区（或曰“文化边缘区”、“文化受容地”），在核心与边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当然，这种中心——边缘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有所异动的。时下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希腊——罗马文化、从希伯来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曾是具有丰厚积淀与强大扩散力的文化源地，以其为核心形成各自的文化圈。另外还有一种更具全球视野的划分：东地中海文化圈（以后扩展为北大西洋文化圈，俗称西方文化圈）、西亚北非闪族文化圈（今伊斯兰文化圈）、

南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中南美印地安文化圈。

文化圈可从地理、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等多种角度划分与命名。上述“东亚文化圈”以地理属性得名，其范围约指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大略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从体质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居民同属蒙古人种；从文化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共同拥有汉字汉文（故有“汉字文化圈”之称）、儒学（故有“儒学文化圈”之称）、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等。

拥有若干文化共相的“东亚文化圈”，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国是东亚最先进、强大的国家，占据文化高势位，是文化输出国，中国的水稻、粟、麦栽培技术，冶金、养蚕、缫丝技术等传入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之相随，前述汉字文化的诸多门类也播扬周边列国。诚如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诗称：

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幸武功庆善宫》）

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正日临朝》）

越、朝、日等东亚文化圈周边诸国，皆有自己辉煌的文化创造，同时也都接受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以日本为例，曾一再派出“遣隋使”、“遣唐使”，昭显了东亚文化圈边缘带研习核心区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强调，日本是中国文明圈的一员，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

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卤水。（《日本文化史研究》）

时至近代，东亚诸国都面对工业化西方的来袭，西学东渐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新命题，东亚诸国在 19 世纪中末叶先后进入社会及文化近代转型过程。比较而言，日本较迅速地吸纳西方近代文明，实现近代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先进国和新的文化源地，中日文化势位对比发生异动，文化传输的主流方向逆转：古代是中国——日本，近代是日本——中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出现留日热潮，便是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努力。进入现当代，中、韩等国现代化取得长足进展，渐成迎头赶上之势，在新的文明水平上，东亚诸国发生着空前深刻的文化互动，东亚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耀，对全球文明的影响力也日益巨大，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当下世界最为强劲的两大大文化圈，当然，其他文化圈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

概言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亚文化圈诸国互为师友，由于文化互动而彼此受益。在近代，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与东亚文化圈其他诸国严重对抗，造成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劫难。郭沫若先生曾把中日两国关系概括为“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反顾东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历程，我们有充分理由宣称：和则互利，斗则两伤。化干戈为玉帛是时人的使命，也正是本书系的基旨所在。

笔者近十余年来多次参加以东亚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事相关合作研究，结识东亚列国学者，并研习其论著，亲炙东亚文化丰富的内涵，渐以推介东亚文化为乐事。2004 年夏至 2005 年夏，笔者访学于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邀约笔者选取一批反映东亚文化的日文书籍，译介给中国读者。受命后笔者即与“日文研”刘建辉博士从近二十年出版的相关论著中择得八种，延请译

者，经两年劳作，成此“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本书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所选择的论著，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间的文化互动（如池田温的《东亚文化交流史》、福井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或用力于东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如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森贞彦的《〈菊与刀〉新探》、上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如古濑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阿部洋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可以一斑窥豹、以蠡测海。

2007年10月24日拟于武昌珞珈山

——中文版《〈菊与刀〉新探》

出版前言

由王宣琦先生翻译的中文版《〈菊与刀〉新探》得以在中国出版，不胜欣喜。在此谨对王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欣闻近年在中国对露思·贝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日益引起关注，我想这正是人们希望更深地了解日本的心愿的一种体现。即使这一关注的背后隐藏着 20 世纪前期日本军阀在中国大规模军事侵略行动这一难以抹杀的记忆，我依然认为它反映出为了解日本而关注《菊与刀》的中国民众的务实态度。这也许是中国人珍惜古老事物的传统性格使他们觉察到不应放弃《菊与刀》吧。

《菊与刀》的出版已经过去了 60 多年，其间亦涌现出了大量有关日本文化论或是日本人论的新著。随着它们的问世，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人们只是关注这些新的论说，而《菊与刀》则似乎已成为陈旧的东西被束之高阁。然而以我的一孔之见，这些所谓新的论著还没有一部能超越贝尼迪克特的学说。

迄今为止，有诸多的学者和评论家对《菊与刀》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评述，但这些评述分歧甚远，既有人将其誉为古典式的巨著，也有人贬斥它毫无学术价值。但是，以我的看法，对其诋毁的人们就不屑一提了，即便是给予了极高评价的人也

仅仅只是对其抱着一知半解的理解。以我之所见，它的真实价值，要远远高出至今所有评论中所给予的最高评价。

此次笔者提供的新书中，有若干此前尚无人论述过的内容，并欲以此来尝试如何提升对《菊与刀》的评价。即便如此，在这本小册子中也只能作出距离完美相差甚远的论述。本书所写的内容，只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推荐而已。《菊与刀》是一本愈读愈觉其深奥的著作。恳切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后，务必再次阅读一遍原著，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去探寻贝尼迪克特书中所蕴含的深邃意味吧。

我的这本书原本是面向日本人而著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说并没有限定读者范围的理由。《菊与刀》应该是一本被世界上的读者广泛阅读、理解的作品，为了这一理解，倘若我的这本书能起到一些推动作用的话，那也完全是因为企盼着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去阅读《菊与刀》的缘故。假如要问到《菊与刀》为何必须要被世界上的人们所理解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我认为此书的根柢中蕴藏的文化相对主义对实现国际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人类民族或集团之间出现的大多数纷争，均源自于难以进行相互理解。我以为，要认清这一困难的本质，不依据文化相对主义，即贝尼迪克特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不可能的。在此，还想对读者朋友们提出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就是希望在读完本书后，务必再一次审视文化相对主义。贝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有着比其他学者更深的洞察，它包孕着在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活动中发挥巨大贡献的可能性。

森贞彦

2006 年春

目 录

序言 《菊与刀》的妙趣	1
第一章 《菊与刀》的形成	4
一 书名——其中所隐藏的奥妙	4
二 作为一个系统的《菊与刀》	11
第二章 开拓未知的世界	17
一 不要称其“文化型”，应赋予它 “文化型”的概念	17
二 没有采用统计方法的缘由	22
三 表达新的概念	25
第三章 模具与地图	32
一 重铸“孝道”的概念	32
二 日本人舍弃“仁义”之概念， 恪守“社会等级制”	35
三 关于“地图”的比喻 （之一·在第三章所读到的）	38
四 关于“地图”的比喻 （之二·读了第四章后想说的）	41

五	日本人的野心	44
第四章	强制力与原动力	47
一	二次元	47
二	忠孝之强制力的侧面与原动力的侧面	52
三	情义与羞耻感的原动力	57
第五章	比较文化的视点	70
一	与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假设的关联	70
二	日本与美国在 nature 的解读方式上明显不同	75
三	论述无人所知的对象	87
第六章	“人情世故”一章的作用	91
一	在本章中提出问题的方式	91
二	再次关注“地图”的比喻	94
三	给“刀”赋予的方向性	97
第七章	羞耻感的文化	103
一	被误解的羞耻感文化	103
二	贝尼迪克特果真藐视羞耻感文化吗	107
三	道德的窘境	110
第八章	日本人的独创性	117
一	两个种类的自我训练	117
二	为了“练达”而进行训练的特征	118
三	身居羞耻感文化之中而超越羞耻感文化	124
四	名人——受到国民支持而被管束着的	

“疑似天才”	127
第九章 “菊”与“刀”	140
一 事实上的结论	140
二 被伪装起来的意志自由	145
三 自我责任	151
第十章 贝尼迪克特的失策	158
尾声：年轻的读者们，请务必超越《菊与刀》的境界 ...	163

序 言

《菊与刀》的妙趣

露思·贝尼迪克特 (Ruth F. Benedict: 1887 ~ 1948 年) 所著的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于 1946 年秋天在美国出版, 两年后由长谷川松浩以《菊与刀》的书名在日本发行了第一部日语版。此书甫一面世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各种书评如潮水般涌现, 与此同时, 有关此书的研讨会也纷纷举办。在此情形下, 此书的社会需求也从未间断。1967 年, 由此书的原译者修订后的《定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再次出版 (本书中的日语译文就是以 1967 年版为蓝本的)。时至今日此译本仍在不断地印刷、发行。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后, 一部学术性著作仍在不间断地反复再版的现象, 可以说在我国出版界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 这本书至今依然对日本人的修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也决非言过其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涉及《菊与刀》的文献繁若群星。笔者在各种出版物和因特网的网页上, 只要发现与《菊与刀》相关的专题文章就立即制成卡片, 这些卡片很快就将要达到 300 张了。我相信, 卡片里面几乎不会遗漏任何重要的文献。即便如此, 笔者觉得还远远达不到某种满足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我看来, 如此之多的文献中竟没有一部能真实地反映出

《菊与刀》的价值。

首先，至今还没有人对贝尼迪克特为什么写出《菊与刀》这部著作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菊与刀》里，作者明确地表示，此项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了以最小的牺牲尽快地结束与日本的战争而进行的必要的情报收集。然而这仅仅是进行研究的理由，而并不是将其研究成果以这种方式 and 这种时期公开发表的理由。抱着这种误解将《菊与刀》认定为是一部研究报告书的人大有所在。1944年夏天开始编写的研究报告书，直至1946年秋天，即战争结束经过了一年多之后才发表，确实是有其原因的。而这些人为了确立前面提到的研究目的，居然连这一基本实情都没有察觉到，这种轻率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贝尼迪克特一经被允许发表她的研究内容，立即开始执笔编著此书，经历了大约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虽然，有曾经完成的报告书作铺垫，但如此之快的写作速度还是令人惊异。而且，作品写得平易优雅，简明易懂。它明显地包含着学术性的价值，但并不是学术论文。她所预想的读者群应该是美国有文化修养的非专业人士——如总统、阁僚、议员、财界、产业界的名人、三军将领、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人士。在1946年秋天这个时期，让这样的一些人去阅读《菊与刀》这本书，作者究竟在期待着一个怎样的效果呢？至今还无人作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

美国的人类学者克里福德·基亚兹在《文化的解读方法/书写方法》（森泉弘次译，岩波书店，1996年发行）一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言论。他谈到，美国人在开始阅读《菊与刀》的时候，认为日本人是与自己作战过的敌人中最难以揣摩其性情的对手，在阅读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地感到，原本自己头脑中非常明晰的西方世界的意识结构却渐行渐远了，当读完这本书

的时候，他们的最终结论是：日本是自己战胜过的对手中最捉摸不定的国家。他虽然没有触及贝尼迪克特写作《菊与刀》的理由，但在无意识中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美国人读后居然会产生这种感想的作品，在1946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得以出版，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当时，对日占领的政策已经确定了，但媾和条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况且，一般的美国人对日本持有的优越感已达到了最高潮。倘若在任由这种情绪发展的状态下签订媾和条约的话，日本将不知道要承担何种负担。其时，只要美国的领导层错误地把握了对日方针，恐怕只会给日本人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只要大多数日本人走向反美的道路，不仅远东的局势对于美国将会极为不利，甚至在世界战略演变的进程中，都有可能被苏联抢得先机。作为有着先见之明的美国人，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一定考虑到了如何阻止人们不要被那些把日本人视为黄皮肤猴子之类的世俗偏见所蛊惑，强硬地给日本提出无理的难题等情绪高涨的舆论。所以我认为，应该充分留意到贝尼迪克特奋笔疾书，以最快的速度写下的《菊与刀》正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完成的。她要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看到日本是我们所战胜的国家中最通情达理的民族。遗憾的是迄今尚无人论及这一点。

仅仅稍加探索，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如此意义重大，而且是至今尚无任何人触及到的问题。假如潜心研究下去的话，新的发现必定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菊与刀》的确可称为是一部既蕴含着高深的思想哲理且又妙趣横生的著作。

第一章

《菊与刀》的形成

一 书名——其中所隐藏的奥妙

1948年，日语版《菊与刀》初版发行时，报刊上刊登了这样一段广告宣传词：

“菊花的优美与刀的杀戮所象征的日本人的性格、生活矛盾——一部破解这一谜团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新著——文化人类学者将告诉您什么呢？……”

这是一段十分出色的广告宣传词。在介绍了《菊与刀》的书名后，立即提示出“菊花的优美与刀的杀戮”这一语调柔和而又引人注目的关键词语，很快就抓住了人们的心。而且这段宣传词是以原著第一章“研究课题——日本”中的下面一段给人鲜明印象的段落为依据的：

（对日本的研究），困难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自日本开启了紧闭的国门之后的75年期间，只要查看一下有关日本所写的记载，就会发现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民几乎未曾使用过的，怪异之极的“可是，又……”的句式在文章中屡见不鲜。只要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社会观察家，通常决不会对日本以外的其他国民进行评述时，指出他们是无

与伦比的彬彬有礼的国民之后，又加上一句“可是，他们又是狂妄不逊、自我尊大的民族”；不会在写到某个国家的民众无比顽固、丑陋时，又补充指出他们“很容易吸纳新鲜事物”；不至于在描述到某个民族多么地柔顺后，又特别说明他们“对来自上层的统治充满了叛逆的精神”；不会在写下他们如何忠实、宽容时，又强调说“可是他们又很不忠诚，心地险恶”；也不会肯定他们确实很勇敢无畏的同时，又大肆渲染他们是如何如何懦弱；不会说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别人的脸色行事之后，接着又说他们其实是非常有良心的国民；不会既描述他们军队的士兵如机器人般地循规蹈矩地接受训练；继而又揭露出这些军队的士兵如何不服从命令，甚至敢于公然反抗上级的情形；不会在说明他们是十分热衷西方文明的国民之后，转而又详细地描述他们仍具有十分强烈的保守思想。同样，通常不会有人在写完一部有关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如何崇尚美好事物，尊敬演员、艺术家，收集了大量栽培菊花的秘诀之后，不会又在另一部书里去补充说明这个民族的国民又是如何崇拜刀剑，将武士推崇为最高荣誉的象征这样的基本事实。

上面这段文字的所在之处，是《菊与刀》的第一页与第二页之间。因此，只要是翻阅过《菊与刀》，即便是连阅读完第一章的耐性和理解力都不具备的人，也一定会看到这段话。而且，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菊与刀》的书名就是由此应运而生的吧。

然而，书中提及的“菊”与“刀”决非如此单纯。而是在间隔了相当长的章节后才论及二者的真实概念。第十一章中